

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

朱国林 范建勇 严 燕

(复旦大学经济系暨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200433)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收入分配与总需求关系的认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消费不振的理论框架,并较好地说明了其它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一些消费特征。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不振 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

一、导言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消费不振。最终消费率从1996年到2000年分别为58.5%、58.2%、58.7%、60.1%和61.3%(中国统计年鉴,2001)。不但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的平均水平,而且与钱纳利的标准模式相差甚远。虽然从1999年开始政府加大了支出力度,使最终消费率有所上升,但反映经济内在消费水平的居民消费率仅仅从1996年的47%,上升到2000年的48%,仍然与钱纳利标准模式(61%)相差很多。消费不振导致投资机会减少,大量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使宏观经济增长乏力。

对消费不振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赵友宝和张越玲(2000),以及刘文斌(2000)等都持这种观点。然而,虽然在直觉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证明。

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指出,必须在消费理论框架内探讨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不同的消费理论,可能蕴含(并非明示)着不同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总结了消费理论的各种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后认为,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但该文还没有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特别是没有研究预防性储蓄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因此,总的看来对这种观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的目的有二:首先,根据中国的经济特征,在理论上完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关系的研究;其次,用这种理论解释中国当前的消费不振现象。

本文安排如下。首先是理论综述,第二节提出一个研究中国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理论框架;第三节将用这一框架解释中国消费不振的几个典型特征;然后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最后是总结。

二、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

消费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朱国林,2002)。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是第一阶段。根据他的这一理论,边际消费倾向(MPC)与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高,MPC越小。因此,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如果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就能提高全社会的总消费水平。

* 本文在第一作者博士论文初稿的基础上经调整、修改而成。三位作者感谢袁志刚教授的悉心指导。第一作者还感谢上海市青年社科基金和法国人文科学的资助,及法国就业研究中心提供的便利。文中一切错误由作者负责。

根据钱纳利(1988),绝大多数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保持在70%以上。甚至储蓄率很高的东亚国家,也在65%以上。进一步,在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经常被忽略。

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IH),是第二阶段的代表。LCH又可分为标准和广义两种。前者认为消费者在生命周期结束时会用尽全部财富,不考虑子孙后代的福利对其本身效用水平的影响;而后者则认为存在王朝效用函数,消费者会留一些遗产给子孙后代。显然,后者是对现实世界更真实的描述。

勃兰德(Blinder,1975)认为,在标准LCH下,消费者的储蓄只用于在退休后收入降低时养老,这就是出于生命周期动机的储蓄。此时,MPC与收入水平无关,收入分配不影响总消费。由于收入等于储蓄加消费,这也意味着生命周期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无关。在广义LCH下,消费者除了有生命周期储蓄,还有用于遗赠的储蓄,即遗赠储蓄。这时,消费者的MPC与其财富(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分配会影响总消费。这与凯恩斯的观点一致。

产生这种差别的微观基础是:遗赠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越高,其中用于遗赠的比例也越高,在生命周期储蓄与收入无关的情况下,这会导致高收入阶层的MPC低,低收入阶层的MPC高。

霍尔(Hall,1978)研究了理性预期下的PIH(RE-PIH)。这是对传统LCH/PIH的一种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拓展。这是消费理论的第三阶段。同样,RE-PIH也可分为标准和广义两种。

RE-PIH与PIH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虽然在霍尔假说下人们的消费行为会发生某些变化,但遗赠动机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尽管霍尔的理论是一大进步,但却没有改变LCH/PIH下得到的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关系(朱国林,2002)。

RE-PIH有许多严格的假定,因此并不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在现实中,这些假设并不一定都成立,比如不存在风险以及信贷市场完善。风险的存在,会促使人们(风险回避者)在生命周期和遗赠储蓄之外更多地储蓄,以抵御可能的收入风险,这就是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s,PS)。信贷市场不完善则导致人们不能无成本地借贷,这会产生流动性不足。相应的储蓄称为流动性约束储蓄(Liquidity Constrains,LC),这两种假说的提出标志着消费理论的第四阶段。也是最新的发展阶段。若把LC理解为一种风险,则可以把流动性约束储蓄归入预防性储蓄。

考虑预防性储蓄使以上的收入分配和总消费的关系复杂化。首先,预防性储蓄是否会改变遗赠储蓄倾向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性质?其次,预防性储蓄倾向本身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如何?

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认为,PS不会改变遗赠储蓄的性质,因为高收入阶层不会过多考虑预防性储蓄,而遗赠储蓄主要由该阶层拥有;低收入阶层则会减少可能的遗赠储蓄,因为预防性储蓄主要由该阶层拥有。这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而,在该文中我们尚未给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

到目前为止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预防性储蓄,大多数消费理论都隐含着收入分配会影响总消费这一关系。当然,这一点并非明示的。这可能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重视收入分配有关。

一些计量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如曼奇克和戴维德(Menchik & David,1983)和穆斯格雷夫(Musgrave,1980)。

三、一个研究中国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理论框架

上一节的讨论启示我们,研究不同收入阶层消费倾向的区别,可以从其储蓄倾向的区别入手。这样做的好处是:人们的消费动机只有一种,即为了获得即时效用;而储蓄动机则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显然,这一角度可以把研究引入更深的层次。

凯恩斯在《通论》中列举了八种储蓄动机,其中包括预防性动机、生命周期动机、跨期替代动机、

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见朱国林(2002)。

独立动机、遗赠动机、贪婪动机、企业家动机和提升动机等。布朗宁和卢萨迪 (Browning and Lausardi, 1996) 认为还有首期付款动机。这实际上是流动性约束的另一种说法, 可以归入广义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除去其中一些明显诉诸于心理和社会学解释的动机后, 经济学家一般把储蓄动机分为三类: 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要研究不同收入水平阶层的不同消费行为, 就必须清楚不同收入水平三种储蓄动机的强度差异。

穆斯格雷夫 (Musgrave, 1980) 认为, 可以把人们的收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 (Subsistence Income, 维生收入, 下文统一用 Y_0 代表), 指用于食品、衣服、取暖等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收入水平。这部分收入将全部用于消费。因此, 其遗赠和预防性储蓄倾向都会很低。储蓄是其没有能力购买的奢侈品。维生收入之上的收入, 称为额外收入, 收入分配对各种储蓄和总消费的影响, 主要通过额外收入, 即 $Y - Y_0$ 的收入来体现。当收入低于 Y_0 时, 生命周期储蓄、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都不存在 (但其储蓄动机仍然存在); 当收入高于 Y_0 时, 这三种储蓄才现实地存在; 并且由于三种储蓄的强度分布不同, 不同收入水平时每种储蓄的数量也不同。

上一节已经说过, 生命周期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无关, 各收入阶层都会把收入的同样比例 k , 用于此种储蓄, 因此在以下讨论中略去。

遗赠储蓄倾向则与收入水平相关, 收入越高, 其用于遗赠储蓄的比重就越大。这一关系体现在图 1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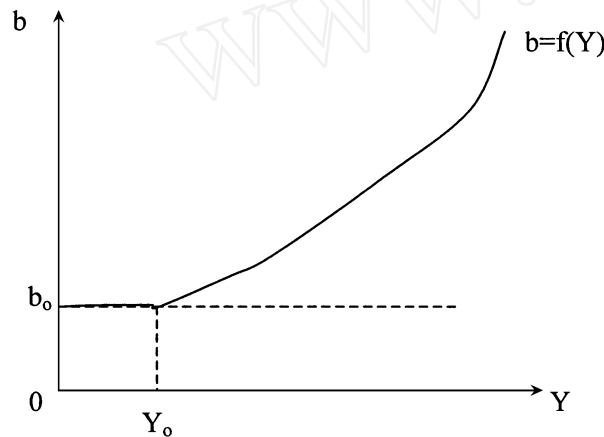


图 1 收入水平与遗赠倾向

在图 1 中, 横轴 Y 为收入水平。纵轴 b 代表平均遗赠储蓄倾向。 b_0 代表一个较低的平均遗赠倾向 (接近于 0), 表示当收入水平较低时 (低于 Y_0), 该阶层只有极少量的遗赠储蓄。

当收入高于 Y_0 时, b 值在 b_0 的基础上先缓慢、再加速地增长。这意味着当收入以线性增长时, 遗赠储蓄以指数增长。相对于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来说, 遗赠储蓄的差距更大。这进一步说明, 即使生命周期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在收入线性增长时, 也保持同样的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 财富分配也会比收入分配更不平等。

根据李实、魏众和古斯塔夫森 (2000) 所引用的数据, 1993 年美国人均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高达 0.79, 1% 的最富有住户拥有全部住户财产总额的 35%, 都超过收入分配的相应基尼系数, 显示出财产分配比收入分配更悬殊。1995 年, 中国城镇人均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28, 财产分配基尼系数为 0.41, 具有同样特征。如果只存在生命周期储蓄、预防性储蓄和遗赠储蓄, 由于前二者均不是较高收入者储蓄的最重要部分, 因此遗赠储蓄一定比收入增长得更快, 所以图 1 所示的关系很可能是成立的。

预防性储蓄的情况比较复杂。预防性储蓄的多少取决于各收入阶层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和所面临的收入风险大小。显然, 可以假定各收入阶层都具有相同的风险厌恶度, 但不同收入阶层面临的风险却不相同!

事实上, 收入水平越低, 其面临的风险可能越大。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这也是主流经济学中常用的考虑风险的王朝效用函数所包含的三种储蓄动机。

他们引自沃尔夫 (E. Wolf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wealth inequalit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42, No. 4, Dec.

假设消费者都是风险厌恶者。

1. 一个原因是流动性约束。众所周知,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是很难从银行借到钱的,因为他没有什么收入可做担保;而一个百万富翁则很容易从银行借到足够的钱。金融市场对低收入者的门槛更高。其它条件相同时,低收入者面对更多流动性约束风险,并只能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克服。

2. 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所面临的风险较大。根据刘建国(1999)引用的吉利斯(1998)的数据,就收入的可比水平而言,中国农民家庭用于储蓄的比率高于城市家庭,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得到证实。这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比城市工资收入者更加不稳定。

刘建国进一步给出了几个农户收入不稳定的原因。比如,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农户的社会保障程度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农户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投资交织在一起等。显而易见,以上几条都以各种形式适用于中国。

3. 斯金纳(Skinner, 1988)发现,自我雇佣者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因为该阶层面临较大的职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这种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自我雇佣者的成份相当复杂,既有收入很高的阶层,如独立开业的律师、医生、汽车专卖店店主、加油站老板等,又可能有收入很低的阶层,如水果摊贩等。但总的来说,由于其经济发达、分工细致,所以自谋职业者除非有很强的能力,是不太可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因此,自谋职业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能力较强、收入较高的阶层。否则,他们一定会去找一个收入较低、但很稳定的受雇工作。这是一个主动的、自我选择的机制。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的知识型服务业并不发达。独立开业的律师、医生尽管其收入也很高,但其数量极其有限,只占自我雇佣者的极少部分,自我雇佣者中的大部分都是低素质的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城市下岗工人。其职业选择大多是在城市摆摊设点,从事小本经营或在乡镇企业中打工;显而易见,这些工作的收入低、风险大。另一方面,在中国,绝大多数自谋职业者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选择自谋职业,因为在体力劳动者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受雇工作。所以,平均说来,中国的自我雇佣者收入低,风险大。预防性储蓄倾向也高。根据以上三个原因,我们认为在中国,收入水平越低,其面临的风险越大。但必须注意:以上结论是根据中国国情推导出来的,并不具有普适性。

以上讨论可以用图2表示。

其中 p 表示平均预防性储蓄倾向,当收入低于 Y_0 时, p_0 表示一个极低的预防性储蓄(接近于0),因为该阶层的收入将几乎全部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品。

令 TS 为总平均储蓄倾向,则 TS 等于平均遗赠储蓄倾向 b ,加上平均预防性储蓄倾向 p 。我们最关心的,是 TS 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为了研究方便,不妨令

$$b = f(Y - Y_0), f > 0, f' > 0, Y > Y_0$$

(1)

且 $\lim_{Y \rightarrow +\infty} b = 1 - k, \lim_{Y \rightarrow Y_0} b = b_0$, 其中 $f' > 0$ 表示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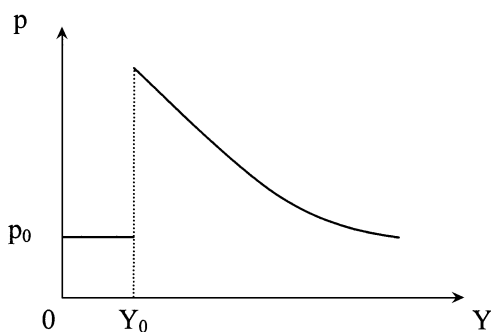


图2 收入水平与平均预防性储蓄倾向

着收入增加,平均遗赠储蓄倾向也上升, $f' > 0$ 说明 b 的增加比 $(Y - Y_0)$ 的增加速度更快。这是根

他们引自吉利斯(1998),《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余永定和李军(2000)认为,由于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国消费有其特殊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本文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此处省略了生命周期储蓄 k (根据前文的讨论, k 为常数)。

据前文的讨论得到的。第一个极限是由于平均储蓄倾向最大为 $1 - k$ ，第二个极限是根据前文的讨论。相应地，还有

$$p = g(Y - Y_0), g < 0, g > 0, Y > Y_0 \quad (2)$$

$$\text{且 } \lim_{Y \rightarrow +\infty} p = 0, \lim_{Y \rightarrow Y_0} p = (1 - k) - b_0$$

(2)式表示平均预防性储蓄倾向随收入上升而递减($g < 0$)， $g > 0$ 这个关键假设的合理性下文会讨论。第一个极限比较明显，第二个极限是因为 $Y = Y_0$ 时， $b + p$ 最大等于 $1 - k$ 。根据(1)式和(2)式，有

$$TS = b + p = f(Y - Y_0) + g(Y - Y_0) \quad (3)$$

TS 的性质决定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

进一步，根据(3)式，及以上各极限公式，有

$$\begin{aligned} \lim_{Y \rightarrow +\infty} TS &= \lim_{Y \rightarrow +\infty} b + \lim_{Y \rightarrow +\infty} p = 1 - k \\ \lim_{Y \rightarrow Y_0} TS &= \lim_{Y \rightarrow Y_0} b + \lim_{Y \rightarrow Y_0} p = 1 - k \end{aligned}$$

这说明平均总储蓄倾向 TS，在收入极高($Y \rightarrow +\infty$)和极低($Y \rightarrow Y_0$)时都很高，趋近于 $1 - k$ 。进一步，(3)式两边对 Y 求导可得

$$TS' = f' + g', \text{ 及 } TS = f + g \quad (4)$$

因为 $f' > 0, g' > 0$ ，所以 $TS' > 0$ ，TS 是递增函数。因此 TS 在 $Y = Y_0$ 时最小，而在 $Y \rightarrow +\infty$ 时最大。

如果 TS 恒大于 0，则当 $Y > Y_0$ 时，TS 必然大于 $TS_{Y_0} = 1 - k$ ，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 $Y = Y_0$ 时，TS 必然小于 0，同时，当 $Y \rightarrow +\infty$ 时，TS 必然大于 0。

注意：我们舍去了 $TS = 0$ 的情况，因为这意味着 $f' = -|g'|$ ，也即遗赠储蓄倾向的上升会完全被预防性储蓄倾向的下降所抵消。这表明二者间具有完全的相关性。而这违反我们对现实的直觉(二者完全是不同的动机，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彼此抵消)。

具有以上性质的 TS 表示在图 3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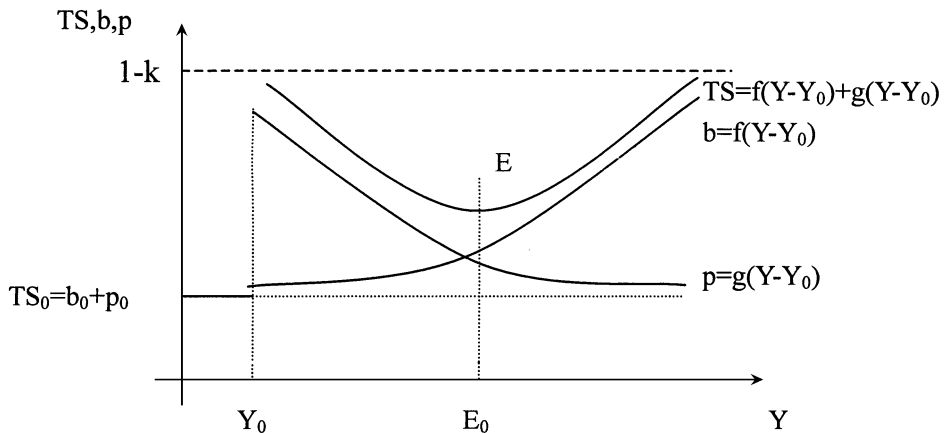


图 3 总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

图 3 表示，总平均储蓄倾向是一条形如马鞍的曲线，而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或是不考虑预防性储蓄倾向的 RE-PIH 时，TS 应是一条向右上倾斜的单调递增曲线。预防性储蓄的加入打破了这种单调关系。而这一点，由中国的经济特征决定。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特征的观察和概括正确，则在中国，收入分配显然会影响总消费水平。尽管由于没有足够的数据，尚无法对 TS 曲线的斜率大小作出任何判断，但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总收入一定时，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越大，社会总消费越充

足;反之,总消费会不足。

最后一个是: $g > 0$ 的假设是否成立,事实上,与对 $f > 0$ 的判断不同,现有的计量结果均无法对 g 的性质作出确定的判断。这是预防性储蓄研究的一个难点。其实 $g = 0$ 时,以上推理仍然成立;只有当 $g < 0$,且 g 的绝对值大于 f 时,以上推理才不成立。然而此时一定有 $TS = f - |g| < 0$,所以 TS 是减函数,这表明 TS 曲线是相反的马鞍形状。然而, TS 是不能大于 1 的,所以这种情况在实际中也不可能发生。因此, $g > 0$ 的假设是合理的。

进一步,根据不同的平均储蓄倾向,可以把收入按从低到高分四个层次,如图 4。

(1) $Y < Y_0$

该阶层的消费者必须把几乎所有收入用于购买基本维持生存的消费品,因此其消费倾向很高,储蓄倾向很小。

(2) $Y_0 < Y < Y_1$

该阶层的消费者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低的消费倾向,表明其额外收入中的大部分将用于预防性储蓄,以回避风险;该收入阶层的平均储蓄倾向随 Y 的上升而快速降低。

(3) $Y_1 < Y < Y_2$

该阶层的平均储蓄倾向在各收入阶层中是最低的,而平均消费倾向则是最高的。另外,该阶层的平均储蓄倾向随收入上升先下降,经过拐点 Y^* 后上升,但可能变化幅度不大;而拐点 Y^* 处的平均储蓄倾向是最低的。

(4) $Y > Y_2$

该阶层的平均储蓄倾向由于遗赠动机较高而升高,虽然其预防性储蓄倾向较低。平均消费倾向也相应较低。随着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其平均储蓄倾向快速上升。这一收入阶层的人必然具有相当高的财富积累,豪宅、汽车等一般奢侈品早已齐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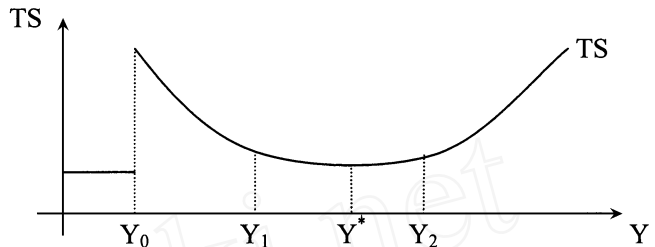


图 4 收入的不同层次

四、对中国消费不振现象的解释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的总消费与收入分配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当一小部分高收入阶层拥有极高比例的财富(收入),而另外大部分人都只拥有少量的财富时,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

根据赵人伟等(1999)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城镇还是农村,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都呈上升趋势,且近年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根据他们的计算,1978 年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12 和 0.16,而 1995 年是 0.340 和 0.28,全国则为 0.46。

陈宗胜和周云波(2001)估计了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他们认为,总体上,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会使全国的基尼系数上升 17.64%! 这样,1995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将达到 0.523,超过 0.5。收入分配不均已相当严重。

臧旭恒和刘大可(1999)认为,1996 年末,我国占总人口 30% 的城镇居民拥有全国储蓄存款余额的 80% 以上,且城镇居民拥有存款最多的 20% 的家庭拥有全部存款的 48.12%。这表明占总人口 6% 的城镇居民拥有全部存款的近 50%。1996 年末全国总存款以 5 万亿元计,则这部分人口(7200 万)的人均存款为 7 万元人民币,户均则为 25.2 万元(户均 3.6 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了一批富裕阶层,其中有些甚至相当富裕。刘福垣(1999)将我国城乡家庭户划分为四个阶层,见表 1。

表 1 1997 年居民金融资产分布结构

项 目	户数(万户)	比重(%)	户均(万元)	人均(元)
第一阶层	441.53	1.3	54.03	14 844.7
第二阶层	2 513.28	7.4	8.59	23 595
第三阶层	16 166.48	47.6	1.73	4 762
第四阶层	14 841.92	47.7	0.15	421
合 计	33 963.20	100	2.23	6 126

资料来源:刘福垣(1999)。

其中,最富裕的第一阶层有 442 万户,以每户 3.6 人计,共约 159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但却拥有 31.5% 的金融资产,户均 54.03 万元,人均 148447 元。而第三、第四两个阶层占总人口的 95.3%,但只拥有 39.9% 的金融资产。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是:高收入者拥有绝大部分财富 ($Y > Y_2$) 但消费倾向很低;大量人口因缺少财富 ($Y < Y_1$) 而无力消费;消费倾向高的中间阶层 ($Y_1 < Y_2$) 人数少,但因缺乏足够的产品创新,消费欲望没有被刺激起来(袁志刚和朱国林,2001)。

因此,可以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影响我国总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

这一假说还可以解释其它一些理论不能解释的中国消费的几个重要特征。

我国当前总储蓄中的相当大部分是由极少数高收入阶层,即图 4 中 $Y > Y_2$ 的阶层拥有;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和预防性储蓄倾向较低,而遗赠储蓄倾向较高。因此,我国当前消费不振的一个关键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太低和遗赠储蓄倾向太高。

有一种观点认为,预防性储蓄是产生当前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上面的事实,因为预防性储蓄只占高收入阶层总储蓄的一小部分。因此,该观点至少是不完全的。而我们的框架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以上事实。

我国消费不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刘建国,1999)。这一点与凯恩斯的预言正好相反。第一节论及的各种关于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传统理论,也都无法解释这一点。但根据图 4,这是显然的,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绝大部分属于 $Y_0 < Y < Y_1$ 阶层,而城镇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 $Y_1 < Y < Y_2$ 阶层。平均来看,前一阶层的消费倾向确实要比后一阶层低。

五、政策建议:目的与措施

虽然收入分配不均是引起总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但因为各个收入阶层的储蓄动机不同,简单的“劫富济贫”式收入再分配政策是无效的,还必须配合其它宏观经济政策,才能消除消费不振现象。简单地说,政策组合必须达到以下目的:

1. 通过增加对贫困人口(收入低于 Y_0) 直接的社会福利援助,提高其收入水平。由于这一阶层的消费倾向很高,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转移支付对拉动消费的乘数作用。这样做也符合公平原则。进一步讲,这个阶层的消费不可能漏出到国外。

2. $Y_0 < Y < Y_1$ 的收入阶层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包括一小部分城镇低收入者。这个阶层由于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所以总体上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少量转移支付对刺激其消费的作用不大。最重要的是降低其所承受的收入风险。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技术创新,增加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促进其由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民。并逐渐将其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

3. $Y_1 < Y < Y_2$ 阶层的人主要是城镇中具有中等收入的居民。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遗赠

动机都不太强,所以其总的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技术创新不足,能够刺激其消费欲望的新产品供给不足。因此,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对于把这个阶层的购买力转化为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其消费很可能会以各种形式漏出,比如出国旅游等。

4. $Y > Y_2$ 阶层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却拥有大部分金融和其它财富。他们由于遗赠和各种原因的强迫储蓄,消费倾向极低。增加对他们的税收可以减少其强迫储蓄,并转化为低收入者的消费。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过多的储蓄以出路,即投资机会。因此,鼓励风险投资、推出创业板,并解除对很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是使其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必要手段。

这样做,不但可以刺激对 R&D 的投入,还可以在技术创新及生产过程中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这又为 $Y_0 < Y < Y_1$ 阶层的人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持续地增加其它几个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以增加总消费,那么由于总消费不足,投资机会仍然会缺少,这也会使过多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并带来更多的利润。因此,我们看到这些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完全有可能在适当的政策组合下,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的关系。

以上政策组合的前提是: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要素。最新的数据表明,到 2001 年 8 月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 7 万亿元,基本符合上述假定条件。据此提出以下一些具体建议。

1. 建立、健全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和法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如果缺乏对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企业家就不会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风险极高、社会效益极大的技术创新活动。盗版的猖獗使我国软件业发展缓慢,是一个典型例子。

2. 打破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间的技术创新投资

在这个资本丰裕的时代,中国这样的二元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缺乏投资,而是缺乏投资机会。缺乏投资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很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打破行业的垄断不仅会吸引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还可以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给民间资本以大量的投资机会,并使得以上一些政策在促进公平的同时,不会损害效率的提高。

3. 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基尼系数,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必须加强我国在社会养老、医疗、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建设。要增加居民的持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重点是支持对贫困人口,即收入小于 Y_0 的最低收入阶层的保障。

4. 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实现

多个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普及义务教育是促进收入均等化的重要措施。在二元经济国家,义务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高于高等教育。

5. 改革税收制度,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

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农村居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为此,可以开征更加累进的遗产税、高消费税等;为增加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可调高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但增加其累进比例,把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目标从城市的中低收入者转向城市的高收入阶层。通过对税基的调整,支持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

例如,城镇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已接近饱和。

由缺少创新商品和投资渠道等导致。

增加社会福利比政府直接采购更有利于扩大总消费需求。因为前者增加居民的持久收入,后者只增加暂时收入。根据持久收入理论,只有持久收入的增加才能增加总消费需求。

众所周知,在目前的环境中,高收入者有各种各样的逃税措施。所以他们实际的税收负担,可能并不高。

六、总 结

本文针对中国消费的具体特征,初步建立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当前消费不振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假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我国总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与传统观点认为的简单单调关系不同。平均总消费倾向在收入水平上呈马鞍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遗赠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预防性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后者是中国及其它类似结构的经济体独有的特征。因此,采取某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缩小低收入阶层的规模,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总消费率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当然,我国的消费不振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可能迅速改善。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通过一定的政策组合,可以使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成为让一部分人更加富裕的前提。这样,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这个关键时期,平等和效率有可能形成双赢。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参考文献

- 陈宗胜、周云波,2001:《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
- 凯恩斯,198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 李实、魏众、B·古斯塔夫森,2000:《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经济研究》第3期。
- 刘福垣,1999:《目标启动、保障消费是当务之急》,《中国经济时报》6月23日。
- 刘建国,1999:《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 刘文斌,2000:《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经济研究》第9期。
- 龙志和、周浩明,2000:《西方预防性储蓄假说评述》,《经济学动态》第3期。
- 钱纳利等,1988:《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中国发展出版社。
- 余永定、李军,2000:《中国居民消费函数和理论与验证》,《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袁志刚、朱国林,2001:《收入分配、技术创新和二元经济转型》,《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 袁志刚、朱国林,2002:《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臧旭恒、刘大可,1999:《我国消费需求态势分析与政策选择》,《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 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赵友宝、张越玲,2000:《消费需求不足的收入分析》,《财经科学》第4期。
- 国家统计局,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 朱国林,2002:《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述评》,《经济学动态》第4期。
- Blinder, Alan, S., 1975, "A model of inherited weal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Nov. .
- Browning, Martin and Lusardi, Annamaria 1996, Household saving: Micro theories and micro f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iv, 1797—1855.
- Hall, R 1978, Th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Sep. .
- Menchik, P. L. ,and David, M, 1983, Income distribution, lifetime savings and bequests, *A. E. R.* , 73, Sep.
- Musgrove, Philips, 1980,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aggregate consumption fun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 Sep.
- Skinner, Jonathan 1988, Risky income, life cycle consumption,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2) ,Feb.

(责任编辑:魏众)(校对:晓鸥)

Land expropriation for a non-public purpose and compens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right

Huang Zuhui & Wang Hui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nuisance of land expropriation for a non-public purpose on 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 The different nuisances of land zoning control and land expropriation for a non-public purpose on 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re analyzed.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not only the efficiencies of land distribution and land expropriation have been weakened, but also the optimal timing of l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delayed, due to the nuisance of land expropriation for a non-public purpose on 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t is the faith that regards the added gain on the land as the public revenue results in the behavior of the land expropriation for a non-public purpose. Based on analysis, two optional solu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Non-Public Purpose; Land Expropriation; Land Development Right

JEL Classification: H410, Q150, R140

On China's Consumption Sa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Zhu Guolin & others
(Fudan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sumption theory, and with the knowledge of China'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has formed a model to explain China's consumption stagnation, then analyzed some phenomena of China's consumption successfully, which other hypothesis can't analyze. We have further outlined some suggestions on policy choosing.

Key Words: Consumption Stagn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JEL Classification: D610, E270, I320.